

# 鲁迅未写成的纪念文

陈子善



想到就写专栏

说起鲁迅未写成的纪念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为人所熟知，但还有一篇他拟写而未及动笔的，就不大为人知道了。

1936年7月5日，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青年朋友、曾协助鲁迅编辑《唐宋传奇集》的蒋经三在杭州坠马身亡。9月18日，鲁迅收到蒋经三友人、作家许杰的信，恳请鲁迅撰写纪念蒋经三。是日鲁迅日记云：“午蕴如来信交许杰信，午后复。”当时鲁迅三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许杰的信是寄到那里，由周建人交其夫人王蕴如转送鲁迅的。

许杰与鲁迅仅见过一面，他晚年写《回忆我和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1989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许杰散文选集》），但把见面时间误记成“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十二月之间”。鲁迅1927年10月19日日记云：“晚王望平招饮于兴华酒楼，同席十一人。”王望平即许杰回忆录中所写的中国济难会负责人王望。这次宴会是商议创办刊物《白华》事，除鲁迅、许杰、郁达夫也在座。然而，鲁迅与蒋经三的关系非同一般，鲁迅日记中关于蒋经三的记录就多达六十余次，所以，他收到许杰信后立即作复。这封信不长，却写得很感人，照录如下：

许杰先生：

来信收到。经三兄的纪念文，我是



永不休战（油画）汤小铭  
中华艺术宫藏

应该做的，我们并非泛泛之交。只因为久病，怕写不出什么来，但无论如何，我一定写一点，于十月底以前寄上。

我并没有豫备到日本去休养；但日本报上，忽然说我要去，不知何意。中国报上如亦登载，那一定从日本报上抄来的。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鲁迅 九一八

鲁迅在信中明确表示，打算撰文纪念蒋经三。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同一年10月19日，鲁迅溘然长逝，纪念文终于未及写出。否则，我们又可读到像《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这样的怀人名文。1936年10月25日，鲁迅逝世后近一周，杭州《晨光周刊》第5卷第41期刊出“蒋经三先生纪念

专号”，发表蒋经三的遗像、手迹，鲁迅、许广平和蒋经三于1927年9月11日在广州的合影，钟敬文、陈貽荪、范守澜等的纪念文以及《蒋经三先生年谱》。当然，最为醒目的是刊出了鲁迅致许杰这封信的手迹。署名王化宇的《卷首语》中称：“鲁迅先生，一个月以前还来信说要写篇纪念经三的文字。不料在这深秋叶红的时候，鲁迅先生，竟也作古。鲁迅先生底那篇简短遗书，也许就是他最后的遗愿呢。”后来许杰在《鲁迅与蒋经三》一文中也回忆道：“由我主编，汇集一些朋友的纪念文章，借当时杭州出版的《晨光》半月刊，出版一期蒋经三纪念专号。”正可复按。

《晨光周刊》并非文学刊物，也很少见，以至新版《鲁迅手稿全集》（2021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初版）所收鲁迅致许杰的这封信手迹，并非直接录自《晨光周刊》，而是据1978年至1986年版《鲁迅手稿全集》转录。许杰在《回忆我和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中也清楚告诉我们：“我早已在抗战期间，将那封原信的手迹遗失，所幸还保存着一份（照相）底片。”按照许杰的回忆，鲁迅此信早就失去了。不料，去年北京突然出现这封信的手迹，经仔细比对，发现信中的“非”“因”“病”等字与《晨光周刊》所载手迹断片均有明显出入，完全可以断定乃赝品也。

## 一种记录

我把自己定位为文艺世界里的门外汉，真有一种获得解脱的自由之感，于是更大胆放远了眼光，在哲人传记中频频张望。

翻读黑格尔的传记，有意外收获。没想到他曾做过21个月的新闻工作，“1807年3月迁居班堡，任当地日报的编辑”，至“1808年12月迁往纽伦堡”，担任中学校的校长。在短哲的新闻生涯中，他写下的随笔文章思想同样深刻，但笔调轻松自如，他列举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娓娓道来，完全一副性情中人的样子。

后来黑格尔“告别”了报纸，其实这张报纸也同时告别了它的读者，惨淡“关张”。报纸的艰难运行，是他从业期间感觉厌烦的主要原因。这种艰难并不是集稿、写作或在读者中是否受欢迎的困难，而是当时新闻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所导致的。

当时，检查机构又一次对报纸下了严厉的训令，认为报纸在内容上又犯下了一个“大错”，但并未指明错在哪里，黑格尔“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什么大忌。后来才知道”一位

手握大权者在通讯稿中用红色铅笔标出了下面一段有伤大雅的话：“巨哥德尔夫曼先生已蒙巴伐利亚国王陛下赏赐一只用珍珠装饰的金盒，乃眷及其千金复各承赐一枚极其精美的项圈。符腾堡国王陛下则赠予王室顾问赖因哈德夫人一枚珍贵的珠宝，外加一笔可观的款项……”原来“真相”如此简单：“报纸不得报道国王的

赠品，特别不得涉及对女士们的赠品。”黑格尔明白了这个道理，下决定心离开报社。

又读哥德尔之传记，亦聊记数笔。当时哥德尔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多年，并获终身职位。他欲入美籍，但入籍需有一场类似于面试的仪式，他事先了解了美国的宪法内容，认真研读做准备。一日他给朋友打去电话，说他在美国宪法中发明了一处逻辑错误，而且此“误”并非小

事，如延而广之，则可能使民主之美国成为专制之国家。哥德尔在电话里将此事告诉好友，好友吃惊不小，生怕他在仪式现场当众发表“高见”，便好言相劝，让他到时千万勿提及此事。仪式当天，好友邀请哥德尔信赖的同事爱因斯坦陪同他一同前往。仪式过程中，法官对他们优礼有加。起初一切顺利，后来法官谈起

事，如延而广之，则可能使民主之美国成为专制之国家。哥德尔在电话里将此事告诉好友，好友吃惊不小，生怕他在仪式现场当众发表“高见”，便好言相劝，让他到时千万勿提及此事。仪式当天，好友邀请哥德尔信赖的同事爱因斯坦陪同他一同前往。仪式过程中，法官对他们优礼有加。起初一切顺利，后来法官谈起

事，如延而广之，则可能使民主之美国成为专制之国家。哥德尔在电话里将此事告诉好友，好友吃惊不小，生怕他在仪式现场当众发表“高见”，便好言相劝，让他到时千万勿提及此事。仪式当天，好友邀请哥德尔信赖的同事爱因斯坦陪同他一同前往。仪式过程中，法官对他们优礼有加。起初一切顺利，后来法官谈起

事，如延而广之，则可能使民主之美国成为专制之国家。哥德尔在电话里将此事告诉好友，好友吃惊不小，生怕他在仪式现场当众发表“高见”，便好言相劝，让他到时千万勿提及此事。仪式当天，好友邀请哥德尔信赖的同事爱因斯坦陪同他一同前往。仪式过程中，法官对他们优礼有加。起初一切顺利，后来法官谈起

事，如延而广之，则可能使民主之美国成为专制之国家。哥德尔在电话里将此事告诉好友，好友吃惊不小，生怕他在仪式现场当众发表“高见”，便好言相劝，让他到时千万勿提及此事。仪式当天，好友邀请哥德尔信赖的同事爱因斯坦陪同他一同前往。仪式过程中，法官对他们优礼有加。起初一切顺利，后来法官谈起

事，如延而广之，则可能使民主之美国成为专制之国家。哥德尔在电话里将此事告诉好友，好友吃惊不小，生怕他在仪式现场当众发表“高见”，便好言相劝，让他到时千万勿提及此事。仪式当天，好友邀请哥德尔信赖的同事爱因斯坦陪同他一同前往。仪式过程中，法官对他们优礼有加。起初一切顺利，后来法官谈起

事，如延而广之，则可能使民主之美国成为专制之国家。哥德尔在电话里将此事告诉好友，好友吃惊不小，生怕他在仪式现场当众发表“高见”，便好言相劝，让他到时千万勿提及此事。仪式当天，好友邀请哥德尔信赖的同事爱因斯坦陪同他一同前往。仪式过程中，法官对他们优礼有加。起初一切顺利，后来法官谈起

事，如延而广之，则可能使民主之美国成为专制之国家。哥德尔在电话里将此事告诉好友，好友吃惊不小，生怕他在仪式现场当众发表“高见”，便好言相劝，让他到时千万勿提及此事。仪式当天，好友邀请哥德尔信赖的同事爱因斯坦陪同他一同前往。仪式过程中，法官对他们优礼有加。起初一切顺利，后来法官谈起

## 哲人传记

李荣

哥德尔离开专制环境而人民主之境实为幸事。哥德尔听闻“专制”两字，马上联想起他头脑中的重大“逻辑命题”，眼看一场滔滔不绝的“演讲”箭在弦上。爱因斯坦立即“干预”，三言两语“叉开”话题，让已入尾声的仪式赶紧结束了事。此“惊险一幕”甚有趣味，亦引发后人好奇心，不知后来是否有人追踪哥德尔的“重大发现”，是否触到人类思维逻辑中的“深幽暗石”。

回味之余，我想到去读一读胡塞

尔传记。这位现象学的开山大师，一辈子的宏愿就是为科学、理性、逻辑“奠基”，也即寻找“逻辑的逻辑”。但他到了晚年时发现，与人类早期为了认识上天而陷入无限回溯一样，理性的“奠基”于奠基之后还带奠基，人们自认为的“最终基础”一旦被照亮，总还有无穷无尽的基础等待被挖掘。数学家高斯所说的“神的算术”，在胡塞尔看来却是“人的算术”，因为他认为“整个算术难道不都是一个为了克服我们智力之本质不完善性而使用的人为手段之总和吗？”这让我想起解数学题的方法，如果我们只想用直观的方法直接去解应用题，稍稍复杂一点就会觉得困难，无从下手，而一应用代数之类的公式，难题马上迎刃而解。抽象的公式仿佛可解一切不可解的难题，而背后还另有一层我们意识不到或者不愿触及的意义：“抽象的伟力”只不过在弥补人类“智性”上的不足而已。人类在这条路途上往往会生出迷思，“将一切都当作可掌控的和可支配的”，胡塞尔曾经将其称为时代的“症结”，唤醒大家对于人类的有限与不足的关注。

哲人用思想为人类点亮前行的道路，使我们得到安顿、安心与安慰。在已经被照亮的光明地带之外，未来必然还有大片有待得到澄明的光明之境。

## 诗 意

“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陶渊明这首《蜡日》小诗，亦如他的绝大多数诗篇，是简洁明白的。蜡日，即腊日。“周曰蜡，秦曰腊。”《礼记·郊特牲》章说：“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饗之也。”李公焕、陶澍和古直诸家均引《礼记》此条作《蜡日》诗题解。他们都认为，《蜡日》一诗，陶渊明写的是腊祭之日与乡邻（邻曲）的宴乐之趣——燕饮之乐。

《世说新语·德行》记载：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汉魏时期，歆蜡日尝集于伍燕饮，王朗也学之。有人向西晋名臣张华说此事，张华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据郭玄注《仪礼·燕礼》，“饮酒以合会为欢也”。燕饮之乐，与其他礼仪之饮不同，旨在“合欢”，突出聚饮的私人性和欢乐意义。这就是魏晋名士所张扬的“放达”。“识度”，应指“见识”“气度”，概括来讲，就是士人所称的“风度”。张华批评王朗效仿华歆的行为是学其“形骸之外”，而离其“识度”更加远。这一方面在于魏晋人标举个性，而模仿是失去个性的表现；另一方面，很可能王朗本人并不是一个放达的人，他对华歆“识度”的推崇，就是一个徒以外表为论的判断。

陶渊明《蜡日》诗描写的不仅是一个腊日祭岁的乡邻节庆酒会，而且与华歆的家庭酒会一样，是一个脱离名教礼制传统的酒会，即“合会为欢”的燕饮之乐。岁末风雪轻扬，盈门种植的梅柳带来回春的消息。在酒会中陶然忘我的欢悦中，商山四皓的《紫芝歌》回荡在诗人的胸间。“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古语“章”“高”通音，章山即商山。

《蜡日》所描写的乡饮欢悦场景和表达的对先世隐者的崇尚之情，在陶渊明传世的诗篇中是通常所见。此景合此情，正是他辞官归田所向往的“园林情”。“澹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提壶挈美酒，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逸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日常生活中，陶渊明更多时候是深感孤独的。他有许多独饮的诗篇。“提壶挈美酒，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细尘羈。”“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觞。检索不获展，仄仄竟良月。”读这些诗篇，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隐逸诗开山者的内心何等孤独和沉痛。但是，读他与乡邻会饮的诗篇，我们又感受到，回归田园，与乡邻相与往来、酌酒闲话，对他来说又是何等酣畅和放达。

陶渊明当然不能期望田园纯朴的乡邻成为他孤洁心志的知音，所以他眷顾远古的隐士，以远逝的钟子期为千古知音。“慷慨悲歌，钟期信为赏。”然而，当他作为一个耕作田间的乡人、作为一个会饮者，他就彻底融入乡邻的生活中。“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安老羞乱语，畅然坐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个“杂乱言”“失行

建设作出中国贡献。

“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发表视频致辞时，郑重宣布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扮靓蓝色星球，世界命运与共，中国责无旁贷。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中国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既是坚持可持续发展、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的必然选择，也为世界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我国“十四五”期间出口风电和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2016年以来，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并动员项目资金总额超过1700亿元；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0余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

法典草案里，“应对气候变化”专章中规定了碳达峰碳中和、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的具体举措，还对开展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合作等作出规定，体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承诺。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法典草案对开展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等作出规定，以法律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心，有利于我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湖北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忠民说。

法典草案“总则编”专门规定了国际条款，提出中国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国际规则的研究与制定，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

## 陶渊明《蜡日》诗解

肖 鹰

次”而“不觉知有我”的状态，不正是《蜡日》所描写的“未能明多少”的状态吗？“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不正是“章山有奇歌”的义指所在吗？

然而，清代图书收藏家和书评家吴骞对《蜡日》做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他援引宋代学者汤汉对陶渊明的《述酒》诗的诠释，认为《蜡日》“犹之手《述酒》意也”。汤汉认为，陶渊明《述酒》诗作于初元二年（421年）刘裕篡宋篡晋之后，“陶公此诗，愤其主篡国亡”“而忠愤激烈”。吴骞以刘裕篡晋弑帝史迹逐句解释《蜡日》之后总结说，渊明为桓公曾孙，昔佩镇荆楚，屡平寇难，勳在社稷。“未能明多少”，谓晋勿勿谓阴计之多，以时无英雄耳，使我祖若在，岂遂致神州陆沉乎！“有奇歌”，盖效宋武帝之意也。言己之悲愤，非言语所能尽，唯章山有奇歌，可以寄意，章山即商山，奇歌即四皓之歌，盖效四皓隐于商山，不与新朝合作也。（《拜经楼诗话·卷三》）

吴骞将刘裕篡晋弑帝史迹比附《蜡日》诗句，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在传本《陶渊明集》中，该诗编排在《述酒》诗后（间隔《责子》和《有会而作并序》两诗）。“其《蜡日》诗，旧亦编次《述酒》之后，而文清（汤汉）未注。予细读之，盖犹之手《述酒》意也。”但是，总览《陶渊明集》，集内诗文编辑并无严格且可以史实佐证的作年顺序。学界较普遍认为《述酒》可能作于刘裕篡晋之后，因为该诗虽然多用隐语（夙词），具体指涉难解，确实表现了较为明显的“忠愤”之义。但没有任何可靠的文献资料可以揭示《蜡日》作年。在作年不可确定的前提下，吴骞的“《蜡日》与《述酒》同叙‘忠愤’”之说是没有前提的。更为重要的是，他逐句比附刘裕篡晋弑帝，于《蜡日》诗句明显穿凿附会。

而民国学者潘重规的《陶渊明腊日诗解》（《国文月刊》第十五期，1942年）写道：“千载之下，玩绎其辞，陶公之心，倏然如见。盖陶公遣世独立，慨想黄度，观世之攘窃篡夺者，不啻蚤虱之过睫。岁暮天寒，聚素心邻曲，饮酒高歌，欣成交集。静观大化，风雪调年，而寒梅作花，一条独秀。天地回游，时运固未有往而不复者乎？当其高歌答和，合意共伸，诵四皓之歌，明一往之志，意气轩昂，壶觞递进，酒中不己，竟忘觞酌之多少矣。盖陶公胸次洒如，傲睨万物，而复冥契冲和，此其所以发咏优游，而玩之有深味也。解者未能寻绎文义，强傅时事。言有求深而实浅者，此类是已。”潘氏的解读及其对吴骞的批评是合理的。吴骞的失误就是以诗为史，以史解诗。他既不懂得诗歌创作与历史经历的复杂关系，更不懂得陶渊明作为中华文明中的千古诗人的胸襟气度和伟大的超越性，因而陷于历史泥坑。

解读陶渊明的诗歌，固然不能脱离他生活的时代，何况晋宋易代是一个生活中者特别沉痛的时代。但是，如果不是将陶诗作为一个历史教科书的解剖对象，真正要探索和发掘这位旷世诗人的思想精神和诗艺魅力，更为根本的解诗途径是深入阅读、品味他的诗篇，从对这些诗篇的深刻感知出发来解读它们。

陶渊明诗歌的独特魅力，既不同于建安政治忧愤诗，也不同于魏晋玄学诗，以其真切自然的感触生活、抒发性情和语言质实而韵致鲜活为独特魅力。无论以忧愤诗还是玄言诗看待陶诗，都是对陶诗的误解、强解。当然，也都是遮蔽甚至践踏陶诗的魅力。

活读胜于死解——这是历史证明应践行的解陶诗门径。

## 铺展绿水青山新画卷

### 绿色转型：开启美丽中国建设新征程

刚刚过去的马年春节，浙江安吉余村迎来八方游客。数万名游客来到这个竹乡寻找地道而热闹的“年味”。

从“卖石头”到“卖风景”，从“守青山”到“富百姓”……20多年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余村通过发展竹林碳汇、开发生态旅游、拓展集体经营，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分红饭”，日子越过越红火。

“2025年全村分红317万元，绿水青山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百姓的金山银山。”全国人大代表、余姚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说，“法典草案中提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等都是‘两山’理念的重要体现。这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要沿着当前的路子继续往前走。”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再访余村，在一家民宿小院对大家说：“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开启美丽中国建设新征程，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绿色梦想不断成为现实。

在湖北宜昌，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临江码头，清澈的长江水中，成群的鱼儿循着江岸从容觅食，映着粼粼波光。不远处的江岸边，厂区的排污口早已永久封堵。

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察看化工企业搬迁、改造以及码头复绿情况。总书记强调，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从山巅到海洋，一体化保护和系统修复自然生态，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彰显出生态治理的系统观、全局观。

荒山披锦绣，沙漠变绿洲。“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绿围脖”；围绕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部署实施50多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更好守护绿水青山……

“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

翻开法典草案，“绿色低碳发展编”引人注目，着眼以法治之力破解生态环境保护实践难题，巩固拓展改革发展成果，为群众留住更多蓝天白云，为祖国守好绿水青山。

在中国产业向新、能源向绿的进程中，一件上衣的印染过程，为这场绿色转型写下生动注脚。

过去印染一件普通的短袖上衣至少需要25公斤水。在山东青岛的一家服装企业，通过使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无水染色技术，每年可以节水10万吨，同时避免大量污水排放。

“破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两难，我国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统筹推进的新路。”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委副书记杨振林说。

“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法典编纂中，积极总结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将各方面认识较为一致、比较成熟的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法律规范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增强，将有助提升各地建设美丽中国的能力。”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余国东说。

“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应该是亿万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她说，一系列规定将有助于推动“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绿色生活方式蔚然成风，让全社会共同推进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更加浓厚。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墨，我们必将接续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崭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